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大国外交新格局

苏长和

[摘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战略。对外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外工作的全面布局服从于、服务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同发展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内在一致、互为增益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与中国大国外交布局推动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和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治理的国内和国际内涵,为世界治理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外工作;新型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5)06-0000-00

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渐次得到清晰的展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战略。对外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外工作的全面布局服从于、服务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同发展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内在一致、互为增益的。国家治理的“四个全面”战略与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治理,体现了作为新型、新兴大国的中国在国际治理领域承担的责任。

作者: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外交工作

(一)中国外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大国的外交工作必须高屋建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开局气势磅礴,外交布局周密完整,外交格局登高望远,中国的大国外交举措在国际外交界备受瞩目。习近平从2013年3月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先后进行了12次出访,足迹遍布五大洲33个国家;期间,李克强也进行了8次出访。2013年和2014年,中央先后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新形势下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努力开创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上述对外工作重要活动显示了外交在党和国家全局性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经过60多年的建设和改革,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已经迈上了一个大台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财、物、智的流动规模来看,2014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人次超过1亿;2014年,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既是一个吸收外资大国,又是一个对外投资大国;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中心;2011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来自国内外发明专利申请52万件,超过美国的50万件,成为世界第一。^①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不振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在2014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30%。

中国与世界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些深刻的变化及其对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影响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存、相互依靠日益加深,两者的关系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中国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越来越多,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象。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对中国这样的新型、新兴大国来说,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状态中,能否引导世界摆脱“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冷战零和思维,防止国际关系退回到大国冲突的历史悲剧之中,与他国共同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第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联动更加密切,相互传导和共振效应更强。一方面,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的相互影响明显加深,彼此的界限变得模糊,中国的国内议题可能成为世界关注的对象,其他国家内部涉及中国的议题也会迅速引起中国国内的反应。另一方面,中国与外部世界面临的共同性问题,需要相互合作共同解决的议题越来越多,例如环境、打击跨国犯罪、反腐败、司法协助、跨国行政合作等等,这些原先由单个国家内部解决的议题,现在越来越多地上升到双边或者多边层次共同协商解决。这些共同议题的增加

以及对外事务工作量的急剧上升,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更高的统筹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的思忖,需要也必须放在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全局下来认识和谋划。

第三,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依存关系状态总体上在向有利于中国的一面在转化,中国与世界关系正在从受动转为能动,中国对世界的能动性影响、世界对中国发挥作用的期待和需求在增加。今日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当前国际关系正在发生一些具有新的世界历史特点的伟大转折和伟大斗争,世界既积聚着更多向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存在倒退回无序和冲突的传统国际关系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部世界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究竟会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充满着好奇,也对中国能够为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关键性方案充满着期待。归根结底,就是中国是走传统大国争霸的外交道路,还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从而发挥中国对世界历史变迁的应有贡献。

第四,对外工作从来都是大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部分。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管理者、贡献者,涉外事务、国际事务管理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的思忖,需要也必须放在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背景下来认识和谋划。在改革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中国对外国际治理的主战和实践,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外部世界的关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治国理政上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及新布局新举措新方略,自然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焦点。中国国家治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以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布局,就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回答。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新时期对外工作的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2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http://www.sipo.gov.cn/yw/2012/201212/t20121213_780213.html。

与外交工作布局是同步进行的,外交工作布局紧紧围绕服从并服务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新时期对外工作的引领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治国理政方略的一个有机整体,有利于确立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整体定位,对对外工作具有引领作用。中央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新时期对外工作的定位和目标,就是服从、服务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外交工作从过去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提高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有利的周边和国际环境服务的高度。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国家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①这次会议确定了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1]这次会议确定了新形势下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标、主要任务。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部分的每一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与外交工作相关。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制

度的一个根本特点和核心。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来看,外交要主动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服务,并提供有力保障。落实到实践层面,外交就是要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维护和延长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确保国内工作大局不被外部因素、外部冲突所打断,从而实现持续崛起。从全面深化改革来看,外交工作也不例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外交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外交同时承担着推进公正合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任务。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外交与外事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也需要改革创新,以适应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大外交格局的发展需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外交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既需要在国内层次做好对外工作和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也需要在国际层次主动参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立改废释工作,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发展利益。全面从严治党则贯穿在包括外交外事的各项工作全过程中。对于外交外事工作来说,严格的政治和外事纪律尤其重要,全面从严治党是巩固党对外交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保证。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新时期对外工作的要求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和实现,离不开外交工作的支持。外交工作要服务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需要在党的集中领导下,创新和发展对外工作体制机制。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新形势下的对外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对各领域各部门各地方对外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大战略投入,规范外事管理,加强外交干部队伍建设,为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1]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建设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它主要集中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

^①《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第一,完善国内层面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建设。新中国建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取消和废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在发展不同类型国家关系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确立了和平共处的外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又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原则,形成了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以及特别行政区对外交往的独特外事体制。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领域的推进以及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部门、地方等开始参与到国家外事的活动中来,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统筹协调日益摆上议程。而且,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需要,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在明显增多,原先的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已经难以适应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时代的国家安全维护需要。

新时期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建设必须体现党的集中领导、统筹协调、分工合作的特点。以国家安全为例,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的制度保障体系有两个部分:一是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保障,二是有法可依、依法治理的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体系的一部分,以做到国家安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一,我国已加入许多国际性和地区性刑事、反恐、司法合作、维和、警务、执法安全合作体系,这是我国开展国际安全合作、在国际上合法维权的法律依据;其二,我国在国内已初步建成国家安治理的法律体系,如《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法》、《国家保密

法》、《国防动员法》等,其在维护国家安稳、社会安定、人民安康,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反对国家分裂、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适应新时期对外工作的新任务,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建设还包括2012年下半年成立的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4年2月设立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要求,成立了中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在安全和对外工作法律层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积极参与执法安全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贩毒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2]

第二,推动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法治建设。构建一个以主权、正义、民主、法治价值为基础的公正国际秩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追求。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

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3]

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中国目前已经加入了400多个多边国际条约,是通用的多边国际关系准则和规则的维护者,同时坚决捍卫以《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主权国际体系地位。为了同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初步确立了提供全球和地区公共产品的大国国际体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等机构的建立,大大提高了中国利用国际机构平台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国际发展的责任。中国还主动参与新兴领域如环境保护、网络、极地、互联互通等议题的国际立法工作,并积极参与调解外交,为国际上的热点问题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

第三,在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统筹中提高国家对外工作能力。从两个大局统筹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国际治理体系的统筹角度看,上述对外工作体制机制以及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的最终目标都是提高国家整体外事治理能力。

就外事行政体制机制而言,当前,外事行政体制机制的范畴在扩大,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外交部门,已经大大延伸到各个部委乃至地方。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下,外事行政体制机制包括两部分:一是与中国国家利益维护和发展(包括存在于境外的中国国家权益)直接相关的体制机制建设,二是与地区和全球关切有关的体制机制。前者包括在党对外交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的领事保护体制、海外权益维护机制、经济外交体制、外援体制、地方对外交流机制、国家安全体制等,显然,这类体制机制与国内经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之间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国内行政业务的国际延伸;后者包括中国作为多边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参与解决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为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这类体制机制除了传统的功能性国际组织以外,尤

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发起成立的像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一定程度上,这类国际组织是中国主动谋划、治理地区和国际事务的试验田。

从外事法律法规体系来说,核心是处理好国内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既包括将国际上通用的规则经过转化变成国内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部分,更要重视积极主动地将中国规则通过多边组织转化为国际规则的一部分,既包括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立改废释工作,更要重视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体系;既要在涉外事务处理中与通行的国际法律法规体系保持一定的衔接性,更要牢牢坚持国内法治体系的独立性;既要重视参与一些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合法性的国际法院系统,更要重视探索建立亚洲地区性法院系统。总的来说,我国的外事法律法规还较为分散,各类外事法律法规及其之间的关系还未成体系,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一个完整的中国法系既包括国内法律法治体系,也应当包括在推进国际事务民主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中所形成的更多具有中国式理解的国际法律法治体系,从而巩固和维护中国和平发展取得的成果,并将和平发展成果通过国际法律规则固定下来。

二、“四个全面”战略思维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四个全面”既是战略布局,也是战略思维,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已经安排了22次集体学习,其中安排了2次学哲学的学习,分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他与对外工作有关的集体学习有8次,分别是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推进我军军事创新、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安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建

设海洋强国研究、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全面、综合、历史、统筹、辩证、和谐是中国人独特的认识世界、分析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有很强的合解而不是分解的特点,擅长从整体、辩证、统一角度认识世界,这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共通的;中国又是一个重史的国家,拥有发达的战略文化,在认识世界上拥有很厚重的历史思维;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蕴含着综合、统筹、共生的精神和资源。“四个全面”战略思维实际上很好地体现了历史、制度、文化、实践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表现。“四个全面”战略思维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与中国大国外交全面布局思维是一致的,对我们运用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处理好新时期对外工作,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整体思维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整体思维要求我们从事物及其发展的全局认识问题,同时处理好整体和部分、重点和局部、眼前和长远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内政来说,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视野,而对外交工作来说,则必须要有“世界一盘棋”的视野;同时,随着内政外交相互联动、叠加影响的增强,大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兼顾好“全国一盘棋”和“世界一盘棋”的关系。

整体思维重视对形势和大势的判断,并在对形势和大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作出整体规划和阶段工作重点部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对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内外部环境综合判断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战略部署。整体思维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来说,一要从党中央新时期全局工作出发,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目标服务;二要从外交工作全局出发,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为我国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

作会议上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大势作出全面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1]

整体思维除了对国际形势和大势发展的综合判断以外,还在于怎样定位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习近平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强调,中国与世界是一种命运与共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双方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这几个整体的概念成为定位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关系的新表述(例如周边国家、亚非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发达国家等)。

(二)历史思维

习近平强调:“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细心观望。”^[1]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正确的世界历史思维,往往在关键时刻就容易选错方向,以致站到历史发展的对立面。历史规律思维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大势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紧密结合起来,将自身的利益与更多国家及其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并在自身发展中去影响世界。中国历来有厚重的历史思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能够坚持正确的世界历史观,始终站在新的世界历史展开的使命上思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在建设时期,我们抓住当时世界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历史大势,支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推动了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成为新兴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而中国正是通过自身的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

树立了发展的榜样。在新的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在这一发展大势中,尽管仍然存在很多矛盾,但是历史规律和发展大势不会变。当今世界仍然不安宁,霸权主义、干涉主义、黩武主义仍然是国际和平的威胁,冷战思维有所抬头,国际关系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它有可能在各国共同努力下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有可能霸权思维影响下退回到冲突对抗状态中。正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发展关键阶段,中国在国际上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引导国际关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4]近年来,有的国家试图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世界历史认识上频繁触及国际社会的底线;少数国家对这种行为不予以谴责,反而予以纵容。这对国际秩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国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并联合越来越多的国家反对这种言行。201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世界历史思维除了历史规律思维,还有对世界历史重大问题认识形成正确判断的思维。历史不容篡改。对这场战争持什么立场、抱什么态度,是世界范围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关系到人类能否汲取历史教训、尊重历史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重大原则问题。法西斯主义曾经给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国际社会必须对否定历史、为法西斯主义翻案的言行予以谴责和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欧洲国家对法西斯主义的绥靖政策,最终纵容了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这个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

(三)底线思维

中国在国际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型、新兴大国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郑重承诺。但是,一些国家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错误理解,认为中国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会牺牲短期利益甚至是核心利益来换取和平发展,有的国家甚至把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一个紧箍咒来约束中国,更有个别国家频繁试探中国核心利益的底线,并将中国坚决维护

核心利益的行为解读为扩张和强硬。从中国自身来说,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还没有实现国家领土统一的大国,同时在陆地和海洋上还和一些周边国家存在领土和岛屿争议,维护国家领土的统一和完整是中国外交、国防的重任。在新时期,国家安全面临各个领域的考验,出现一些新特点新趋势。当前,国家利益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主权管辖的境内,关系到中国国内发展的海外利益存量、流量、增量规模都在上升,维护好我国的海外利益和权益成为新时期对外工作的一个新任务。因此,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讲清楚和平发展道路与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划清和平发展道路的底线,越来越有必要。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有权益底线的。2013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围绕和平发展道路为主题的第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5](p.249)]同时,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这段话为和平发展道路划了一个底线,也就是绝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一段时间以来,针对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一系列外交军事举措,外部世界认为中国外交变得强硬了。这是一种有意误读。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举措和行为,不是外交变得强硬了,而是中国正当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然,和平发展应该成为对各国外交道路的共同约束,也就是说,要以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都应该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共处。”^[5](p.249)]因此,和平发展道路不能仅仅只是中国外交道路的选择,也应当成为以构建合作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各国共同遵循的规范。

(四) 统筹思维

统筹协调、综合施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征之一。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统筹思维和统筹能力。“四个全面”战略思维也是统筹思维。做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更需要用统筹思维来认识、分析和解决对外工作的议题和难题。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统筹议题:

第一,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5](p.299)}在新时期,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关键在于细化、落实。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通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1]其中,习近平首次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之后,又增加了统筹好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的要求。

第二,统筹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统筹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就是以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促进安全,以强有力的安全体制和能力维护发展。“四个全面”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有效、有力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呈现内外联动、新旧叠加、时空交错的特点,探索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团结和人民幸福安康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有紧迫性,也有必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

国防军队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网络与社会信息化工作、文化工作、经济工作、科技工作、粮食工作、生态文明、海洋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和核安全等一系列讲话,在我国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同时国内外安全形势面临新的复杂考验情况下,系统阐述了如何实现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安稳、世界安宁四位一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概括起来,就是在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围绕两个大局进行安全思忖和谋划,把握新时期安全的三个内涵,在处理好五对关系中,实现国家安全的四大目标,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国家安全道路。^①

第三,统筹陆海,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我国地缘格局基本特征是依陆向海,我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同时,我国沿海和内陆发展还存在不平衡,老少边穷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内陆地区,承担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因此大陆与海洋应当统筹谋划。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来看,世界经济重心出现东移的趋势,我国的周边集中了许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前景可期。另外,我国发展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和市场,其贸易通道过多依赖少数海路。这些约束条件使得新时期中国需要用统筹思维看待大陆和海洋问题,将两者孤立、割裂开来,都不能突出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比较优势,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统筹谋划,才能打开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外交大格局。依陆向海是中国的地缘特点和优势,这个特点决定中国可以在亚欧大陆的协同与整合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统筹思维而不是对立思维。因此,从糅合大陆秩序和海洋秩序为一体的角度,以及从亚欧大陆整体发展的角度,有助于我们超越海洋—大陆的两分法思维方式,更全面地估量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

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这个国内国际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带一路”战略很好地体现了全面和统筹的战略思维。“一带一路”战略不只是一个外交布局,它也涉及国内发展大局;“一带一路”战略也并不只是着力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它还涉及政策、经贸、人文等各个领域的互联互通,也就是“五通”;^①“一带一路”战略更不是外部舆论所谓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战略重在将中国自身发展战略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衔接和对接,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型区域合作道路。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下,中国已经同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制定了双边外交5—10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一带一路”战略有效地配合了新时期我国周边外交工作,使得周边外交有了实施的抓手,对周边外交工作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完整的“一带一路”战略除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主干,还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一带一路”战略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其逐步实施对探索亚欧发展中国家新型区域合作道路以及构建我国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五)合作共赢思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于内政,外交工作的全面布局服从服务于这个总布局,其既要为国内大局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也要回答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如何对待国际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建设这样一个国际责任问题。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不仅仅是中国内政面临的议题,它们同样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内政议题。各国做好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需要合作共赢而不是你输我赢思维,不少国家内政陷入对立对抗甚至分裂冲突,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包容性的改革发展稳定举措。对于国际关系来说,各国面临的政

治、安全、经济、社会之类的共同议题与日俱增,这些议题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状态下,“合则两赢,分则两输”、合作比不合作收益更大,几乎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条规律。此外,我们也要看到,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的政策出现内向内顾的特点,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同时,当前国际关系还存在冷战思维,结盟对抗行为并没有弱化。任何有历史意识的大国,都应该有责任去避免全球性结盟对抗的后果。在这种环境下,“国际关系向何处去”再次成为一个时代问题,“普世价值”论、全球治理论、霸权冲突论等各种思潮和方案纷起。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这一时代命题的回答,也是推动国际关系在正反力量交织关口,摆脱冷战思维干扰,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引领理念和解决方案。合作共赢理念贯穿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全面布局中。在政治外交领域,着力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承认世界上存在结盟政治的现实,但中国坚持在不结盟原则下广交朋友,走结伴不结盟的道路,更希望各方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中国迄今已同75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国际安全理念,各国在安全上要照顾彼此的舒适度,反对搞冷战结盟对抗。在国际经济领域,强调互利而不是互害,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朝着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同时对外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系,并将新型义利观作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指导理念。

(六)和谐共生思维

和谐共生是蕴含在东方文化中的一种智慧,旨在在对立、对称、矛盾的事物中求得统

^①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演讲中提出区域合作的“五通”理念,也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参见习近平:《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290页。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中,“五通”表述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参见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

一和共生。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发展道路、多元文明格局、多极世界并存共生的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然而,人类至今还没有树立起不同文明友好交往的基本原则、价值取向和实践模式,“文明冲突论”于是不时扩散,但其绝不是文明的前途。“普世价值”思潮、新殖民主义思潮、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等等,只会加剧文明交往的隔阂、误解、冲突。当今世界,文明与文明之间、国与国之间、各国人民之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都需要探索和谐共生的发展之道。世界只有在承认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相互尊重,相互欣赏,才能推动文明交流向更高阶段迈进。和谐共生恰恰是在尊重差异和多样的基础上,为多样文明学会和平共处指出了一条出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只是成为一个物力大国,同时也是文化和思想大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同样需要落实到文化领域,也即中国究竟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文化方案。

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文明和国家之间的交往亟待树立相互欣赏的思维。所谓相互欣赏,一是文明与文明之间应该各美其美,相互欣赏,并将其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美德;二是各国之间要尊重彼此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所谓“履不必同,斯于适足;治不必同,斯于利民”;^①三是摒弃文明之间的敌友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思维,倡导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新型国际关系文化,并最终逐步深入各国国民的国际观教育之中;四是文明之间应该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扩大合作的交集范围。“中国梦”提出的时候,一度引起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误读和误解。习近平在出访中注重从中国梦与对方梦相通的角度阐述中国梦的意义,在俄罗斯,强调中国梦与俄罗斯民族振兴梦是一致的;在美国,强调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

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相通的;在非洲,强调中国梦与非洲发展梦是衔接的;在韩国,强调中国梦与韩国梦携手并进;在巴西,引用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说的“世界掌握在那些有勇气凭借自己的才能去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手中”,很自然地提出中国梦和拉美梦息息相通,中拉双方要勇于追梦、共同圆梦;在澳大利亚,引用当地人常说的“没有梦想就会失去方向”等。通过这种方式,很好地化解外界对中国梦的一些误解和误读。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思路和理念的集中体现,以“四个全面”引领各项工作,就牵住了国家治理的“牛鼻子”,并以此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把握全局,围绕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大国外交新格局。同时,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和理论指导下,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以及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与中国大国外交布局推动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和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治理的国内和国际内涵,为世界治理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 [1]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11-30.
-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14-10-29.
- [3]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6-29.
- [4] 习近平. 在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3-25.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 寒 江

^①清代魏源语。引自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5 页。

“Rule by Man” and “Rule of Law” in Marxism Discourse: Studing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peech Series and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Party’s Eighteenth National Conferenc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rule by man” and “rule of law” denies abandonment to contemporary Western discourses as Marxism fundamentally differs from other Western discourse in the essence and nature of the two concepts. In some sense, distinct historical entities with their unique subjective initiative, even confronted with the same condition, could lead to entirely different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results.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 of a nation have a kinship with its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s. Therefore, the only way to solve problems in China lies in seeking a suitable path and approach within the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modernizing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 which requires reference to and lessons from all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s in human civilization, involves more creative progres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ealities than blind copying others’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Li Shen-ming)

Two Theoretical Premises of Understan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Marxism which returns to the origin, keeps open to new, and advances with the times, reflecting both solemn historicity and strong reality. Fo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 it is indispensable to distinguish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Marxism and correctly evaluate the relations of eras of Mao and Deng. (Wang Fu-sheng and Gan Lin)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 Rural Areas Through Volunteer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Volunteer Service Station in Village “S”: With continued Urbanization, rural society is experiencing dramatic changes, which affects not only the modern village management but the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 rural areas. It is insufficient to confine village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promotion to the strength of local grass-roots authorities. And non-governmental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can play a unique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socialist values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the volunteer service station in village “S”,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illage volunteer service and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and cast about for the feasi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 through in-village volunteer service, which may provide vast rural areas with useful reference. (Liu Xin-ling and Chen Jin-ping)

On “The Four Comprehensive”: The Strategic Plan and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Current Stage: “The Four Comprehensive” is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upho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iders such a basis as its underlying principle. Meanwhile, as a new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at current historical context, “The Four Comprehensive” also embodies positive responses to newly-emerging challenges and issues for either general conditions or more specific areas, propell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sense, “The Four Comprehensive” is surely the fundamental strategy for current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practice guideline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current stage. (Wu Xiao-ming)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 and the New Diplomatic Pattern for Great Powers: With Chinese people’s effor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 acts as a key strategy for realizing China dreams of rejuvenation. The Foreign Affairs have long been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CPC system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 peaceful and st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needed to carry out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hile the overall layout for foreign affairs supplements and complements that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 which complies with bo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lobal currents with the embodiment of deep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policy corresponds to and supple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new st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ering on win-win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s. The strategic layout ush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volutions o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promoted by China power diplomatic layout. They collectively constitute Chinese governance both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nse and offer a sol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Su Chang-he)

Comprehending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 A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Summarized and refined from CPC’s experiences in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layout focuses on a panoramic view of China’s realities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policy not only integrates theories, strategies, foresight with practice, but unites the essence of various Pre-Qin schools as well as that of thousand-yea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respec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helps to deepen our recognition of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layout. (Jiang Yi-hua)

The Political Logic of Bringing Forth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a in a Substantial Leap: On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Layout and Politics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the leading strategic layout to realize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a, “The Four Comprehensive” would exert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an all-round way. 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pushes forward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e future-oriented, and upgrades the character of political culture from the phase of elements generation to that of overall development. “The Four Comprehensive” is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realiz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olitical logic of bringing forth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a in a substantial leap. (Zheng Chang-zhong)

The Mainstay Role of CPC in Anti-Japanese War: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Anti-Japanese War is a nationwide war